

新观察

独创,乃文学之命脉

□徐锦庚

有年轻的写作者问我:什么是好的文学?我答不上来。好与不好,见仁见智。时代不同,标准也在变。但若问我:文学作品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独创。

没有独创,就没有文学。这话看似绝对,却经得起推敲。一部作品,无论辞藻多华丽,结构多精巧,若精神内核是前人的翻版,语言方式是已有的拼凑,情感温度是他人的复制,就算不得真正的文学,至多算是“文字的摆设”。

独创并不神秘,也不是天才的专利。它是一条可以修炼、可以靠近的大道。

谈及独创,人们容易步入误区,以为它意味着横空出世,毫无依傍。一些写作者诚惶诚恐,不敢借鉴前人笔法,写出的东西僵直生硬。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天下文章一大抄”,索性放弃独创。

关于这个问题,唐代韩愈在《答李翱书》中,有一段精辟之言。他说,当文字从内心倾注于笔端时,“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所谓“陈言”,清代学者刘熙载解释过,认为其不单是指剽袭古人的言辞,也包括“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的见识。换言之,真正的独创,必须同时完成两件事:在形式上,要剔除那些被用滥的陈词滥调;在内容上,要摒弃那些人云亦云的庸俗之见。它要求写作者从语言到思想,都拿出自己打磨过、提炼过的东西来。

由此可见,独创不是拒绝前人,而是消化前人。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敢于破,更敢于立。每一位写作者都应该坦然承认: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那肩膀上的人,眺望的必须是属于自己的天空。

破除“陈言”之后,如何立起“新意”?苏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示范。

苏轼一生推崇“自出新意”。他曾评价自己的书法:“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细读这句话,“不践古人”并非完全抛弃传统,而是不要亦步亦趋地踩在前人的脚印里。苏轼早年遍学晋唐诸家,中年后转爱颜真卿、杨凝式,且对同代书家也非常推崇。他深知“工摹临者非自得”之道,主张“唯神是求”,追求神韵和精神,而非外形和皮毛。他将百家之长化入己身,最终铸成独一无二的自己。

“自出新意”的新意,其源头在何处?它不可能凭空而来,只能来自写作者本身,来自他看世界的方式、感受生活的深度、理解人心的角度。

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有一段关于灵感来临时的描写,读来仍令人感同身受。他说,创作开始之时,写作者要“收视反听,耽思傍讯”,屏蔽外界干扰,沉入内心的思虑之中。然后“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精神驰骋于天地之间,到文思降临的那一刻,“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情感逐渐明朗,物象随之涌现。陆机还表示,这灵感一来,“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难以捉摸。

这就是说,创作中最珍贵的东西,独属于你的灵光一闪,不能靠搜肠刮肚,生搬硬套制造出来,而是在你全身心投入生活、认真思索之后的自然涌现。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流过的泪,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某一时刻汇集一股力量,推动你写出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句子。

一个天真的孩子,举手投足间,自有动人之处。一个戴着假面具、故作老成的人,反倒令人厌恶。写作也是如此。文字之所以能打动人心,不是因为辞藻华丽、技巧高明,而是因为它是鲜活的、真诚的。写作者要想打动读者,首先要打动自己。你越是诚实地呈现出真实感受,文字就越有生命力。那些从书本里批发来的情绪,从流行文化中舶来的腔调,无论包装得多精美,都不会有生命力。

如何写出这种“鲜”与“真”?唯有一个办法:把自己深深扎进生活里。

评论

时间的考古与文脉的重建

——读姜明的散文集《八千年的凝视》

□章夫

姜明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八千年的凝视》以独特的大散文笔法,构建了一部关于时间、记忆与存在的多维沉思录。作者承袭了古典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兼具当代大散文的开阔格局,形成了“古朴不泥古,厚重不晦涩,深情不矫情”的鲜明气质。他将史笔的严谨、诗笔的灵性、我笔的真切与融笔的通达熔铸一炉,形成了一种具有辨识度的写作风格。

在专业与大众之间架设桥梁,是历史文化散文的难题。在《八千年的凝视》同名篇章中,姜明从贾湖龟甲、良渚刻符到青铜铭文、秦诏小篆、里耶秦简,写到薛涛笺上的墨迹,每一处解读背后都有坚实的文献支撑。但他并未止步于知识的搬运,而是让这些文明的碎片在文字的烛照下重新“开口说话”,让冰冷的史料转变为可感、可思的生命经验。在《我的草堂》中,草堂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成为一个精神容器,盛放着杜甫的颠沛与坚韧,也映照了当代人的漂泊与求索。住在草堂附近的“我”与诗圣杜甫产生了跨越时空的联结,文字在史学求真与诗学求美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既有画面的质感,又有韵律的流动,让沉默的时空在隐喻中重新获得表达的活力。

姜明始终让一个作为观察者、思考者和体验者的“我”在场。《蜀道书简》以书信体与两位古人——唐代的“李太白”(李白)与明代的“李太白”(李璧),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串联起蜀道的历史烟云。“我”并非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而是一个带着疑惑、感动与谦卑的探寻者。“我”的有限视角,构

成了读者进入历史的入口,将磅礴的文明史诗转化为亲切的精神对话,使散文充满人文温度,成为一场返回汉字故乡、追寻巴蜀文脉的精神朝觐。

散文集在结构上的匠心,是其能承载“大”之重量的关键。姜明构建了一套多维、立体的叙事体系。“凝视”是贯穿全书的哲学姿态。它不是单向的、主体对客体的观看,而是双向的、建构性的“相遇”。姜明的笔下,当我们凝视三星堆的青铜面具时,那双眼也在凝视着我们。这种互视关系,让古今对话成为可能。作品巧妙地采用“现实—历史—现实”的闭环结构,从成都博物馆的现场出发,潜入汉字、蜀道、草堂的历史纵深,最终带着历史的启示返回对当代处境的反思。这种结构不是线性的追溯,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上溯八千年历史,再回归当代思考。每一次回归“当下”,都因历史的浸润而获得了新的理解层次。时间在此不是单向的河流,而是可往返、可对话的“场域”。

全书以三星堆、蜀道、草堂、三苏祠等具体的文明遗址为“纬线”,以坚韧、通达、诗意栖居等抽象的文明精神为“经线”,编织出一张精密的意义网络。每一个篇章都如同一个网络,既独立成篇,又与其他网络紧密相连。这种网状叙事,避免了传统历史散文容易陷入的“景点导游式”平面化叙述,呈现出文明生长的复杂性与立体感。

姜明的散文具有鲜明的杂糅特质。他打破了散文、学术笔记、旅行文学与抒情诗诗的境界,形成一种开放的文本形态,将思想的重量、知识的密度与文学的审美相融合,突破了散文是“小品”“闲笔”的固有印象。散文可以承载对文明、历史的系统性思考,成为具有建设性的“大说”。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焦虑,姜明立足于巴蜀文明进行解码,告诉我们,真正的“本土性”不是封闭的,而是理解“普遍性”的独特路径。通过对汉字演变、蜀道精神、杜甫诗魂、苏东坡家国的解读,揭示中华文明于多元中求统一、在传承中谋创新的核心特质。

在阅读日益碎片化、浅表化的趋势下,《八千年的凝视》提供了一种珍贵的例证。作品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望,更是对如何走向未来的深刻启示——当我们学会与时间深沉对视,便能在流转的万象中,辨认出那根永恒的精神线索。

(作者系成都市作协副主席、评协副主席)

当我们通过深扎生活和长期积累,逐渐拥有独特的声音之后,一个更内在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如何确保笔下的文字,都能配得上“文学”二字?或者说,文学的尊严,究竟建立在什么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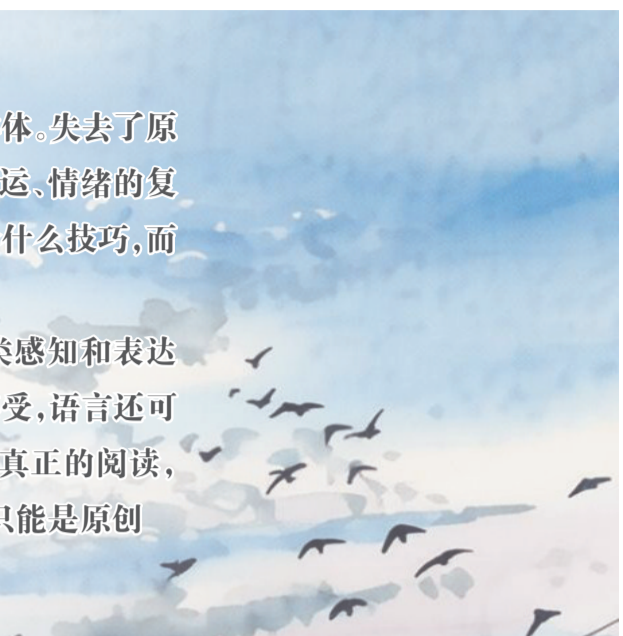
我在长篇报告文学《台儿庄涅槃》中,曾写到滕县保卫战,王铭章将军战死沙场。过去,普遍认为他是“自戕殉国”。1938年《大公报》转载中央社报道,称他腹部中弹后,高呼口号,用手枪自戕。1986年电影《血战台儿庄》,也再现了这一情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亦采此说。然而,2014年,我在成都搜集川军抗战史料时,王铭章的嫡孙王德明告诉我,将军的警卫副官李绍坤晚年亲述:王铭章是被七颗机枪子弹击中,当场阵亡,并非自戕。王德明还提到,电影拍摄时,他们曾与导演讨论,导演解释为“艺术再加工”。因此,我在书中否定“自戕”的说法。

滕县保卫战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县长周同。城陷后,外界盛传他“坠城殉国”。《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也曾撰文记述,标题即为《滕县殉国县长周同》。后来许多文章更绘声绘色:王铭章战死后,周同抚尸痛哭,高呼“中国不会亡”,随即跳城殉国。就在我对周同敬仰有加,准备浓墨重彩起笔时,偶然看到一条信息:1948年济南解放时,章丘县县长周同被解放军活捉,1951年病死于临沂监狱。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名字不常见,会不会是同一个人?经过半年艰难考证,真相令人大跌眼镜:周同并未殉国,而是趁乱混出城,逃难途中病倒,被中共地下党员马奉我营救。国民政府误以为他已殉国,予以隆重表彰,引发同僚嫉恨,密告他通共。周同为求自保,不仅公开反共,还逮捕救命恩人马奉我,并残忍地将其活埋。于是,我独辟一节,还其真相,标题为《不同周同》。

这件事说明,所谓原创,并非你比别人多会什么技巧,而是你比别人多走了一段路,多下了一点功夫。

一个坚持“唯真是求”的写作者,要学会拒绝两种东西:一是对他人作品的掠夺,二是对自身经验的轻浮消费。前者自不必说,那是连底线都守不住的失格;后者往往更为隐蔽,也更为常见。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文字,流畅、漂亮,甚至精致。但读完之后,像饮了一杯白水,什么也没留下。为什么?因为写作者只是熟练地操弄一套现成的话语模板。这种“熟练”,恰恰是对文学尊严最大的侵蚀。

文学的尊严,不是一种外在的、被授予的光环,而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确立的品格。当写作者坚持写自己看见的、感受



到的、思考过的东西,不被任何流行的话语所裹挟,其文字就会自然散发出不可复制的气息。这种气息,比任何防抄袭的技术手段都更牢靠。

原创不是文学的属性,而是文学的本体。失去了原创性,文学便不再是文学,会沦为信息的搬运、情绪的复读、知识的堆砌。所谓原创,并非比别人多会什么技巧,而是比别人多走了一段路,多下了一点功夫。

文学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拓展人类感知和表达的疆域。它告诉我们: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感受,语言还可以这样组合,世界还可以这样观看。每一次真正的阅读,都是一次认知边界的爆破。而爆破的引信,只能是原创。

从创作本体论的角度看,文学的存在方式,决定它无法被二次加工而不丧失其本质。剥离作者独特的语调、节奏、视角和情感温度,剩下的情节梗概和主题大意,根本构不成文学。你可以用三句话转述《红楼梦》的故事,但听者绝不会认为自己读过了《红楼梦》。因为“文学”,就存在于那些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词语排列之中。

正因如此,每一次真正的创作,都是一次“孤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治学和成事的三重境界,认为其中最高的一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那人”,其实就是属于你的独创之声。在你找到它之前,你可能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寻觅,在琐碎繁杂的生活中摸索,在无数次的自我否定中挣扎。你焦虑、怀疑,觉得所有的话都被人说尽了,但只要你不放弃对“陈言务去”的苛求,不放弃对“自出新意”的追求,不放弃对生命体验的深耕和真诚,那个声音终会在某一天忽然出现。

它也许会让你自己都感到惊讶: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写。(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



“把树种活了,人才能活”

——评张雨晴的报告文学《大漠芳华》

□余三定

张雨晴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漠芳华》系统地描写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漠的治沙女英雄股玉珍的感人事迹、重要成就和人生境界。作品展现了股玉珍坎坷而奋斗不止的人生历程,包括她的穷苦身世、遭遇包办婚姻、不屈不挠战胜沙漠灾害等经历。

1966年,股玉珍出生在陕西乡下,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孩,从小受苦,没有上过学;1985年,股玉珍由父亲做主,嫁给了与她家相隔不太远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漠中的白万祥。她抗拒了七天七夜后无奈屈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并开始在她家沙漠里植树,与风沙抗争,最终获得成功。作品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艰难的植树治沙过程中,他们要找水、找树苗,要栽种、施肥、护理、抗病虫害,困难层出不穷,有做不完的事。他们从栽上从家带来的两棵小杨树开始,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使沙漠变成绿洲。“40年,从最初无际黄沙到现在的无边绿野,从最初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沃野田畴,这不是一个股玉珍的福祉,而是千千万万人的福祉;这也不是股玉珍一个人的毛乌素,而是地球人共同的毛乌素。”作者对他们的治沙与奋斗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品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股玉珍和白万祥在治沙过程中取得的成果。1985年,他们栽下的两棵杨树在精心护理下,成活了一棵。“那一棵成活的杨树长得欢实,无需再添水加肥,也不惧怕风沙骄阳,自顾自蓬蓬勃勃地生长。枝繁叶茂,撑起一团绿,成为背背塘沙漠里的第一抹绿色。”两人用家养的唯一一头羊换来600棵树苗,其中一半杨树,一半樟子松,虽然遭遇风沙打击,还是存活了不少。随后,白万祥打工的雇主送了四捆小叶杨裸根苗,他俩抓紧栽种,逐渐取得成功。“等到背背塘的沙土变黄又变白,背背塘也就走过夏天来到了秋天……在地窖子周边,沙巴拉地附近,十几棵一伙,几十棵一团,一两百棵一片,费力地长出绿叶的树木星星点点,背背塘像打满补丁的旧衣裳。”他们的防风治沙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后来,夫妻俩花半个月时间,栽下了国家提供的5万棵树苗。两人一刻也不敢松懈,在沙漠里搭个窝棚,不分白天黑夜浇水保养。经过40年的辛勤劳作,他们建成了7万多亩的“玉珍家庭林场”,股玉珍当上了由47家企业和造林大户组成的鄂尔多斯市毛乌素林产业协会会长,创造了人间传奇。

日子苦的时候,“硬撑着往前奔”;日子好了,就要“喊着唱着”。股玉珍特别执着,认死理,眼里只有树,也只有种树这份活儿,才能让她焕发出所有的能量和热情。在她心里,沙漠里把树种活了,人才能活,种越多的树,人才能活得越好。作品如此描写股玉珍的内心世界,向往追求与情感寄托,使楷模成为一个血肉生动的人物。

(作者系湖南省评协副主席、湖南理工学院原院长)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当下,流动现代性改变了稳固的社会结构与生活秩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进一步催生了全新的生产、认知、交往与娱乐方式。在新的时间与经验面前,曾经不言自明、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时代熏风的激荡下开拓出新的边界,展现出更多样的形态,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新问题。

记录当代职场的人心浮沉

职场是现代生活的重要场景,近期的一些文学新作将目光聚焦于当代职场,对职场生态与人心浮沉进行细致摹写。何田田《池上楼志》(《福建文学》2026年第4期)与周芳《忽恍》(《长江文艺》2026年第4期)均以暴露的笔法写出了当下社会中的职场与权力场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但在暗潮涌动的权力场中,总有人选择坚守初心,守望温情。杨少衡《交叉路口》(《湖南文学》2026年第4期)与房伟《银鱼吻》(《长江文艺》2026年第4期)均写了这类人物。《交叉路口》中副县长贾睿本着“仁者爱人”的初心调查燃气泄漏事件。在事件处理后,贾睿坚持责任担当与雷亚强注重程序导向碰撞出激烈火花,最终引发了一场管道爆炸事故。任职结束后,贾睿放弃调任省城机关的机会,自请留任将功补过,展现出青年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银鱼吻》塑造了一位踏实低调、有人情味的挂职干部朱五明。钉子户永生伯在搬迁动员工作现场意外发病离世,朱五明因此受到牵连停职,心灰意冷离岛,但其一心为民的作风却收获了漫岛居民的信任与认可。房伟透过琐碎复杂的基层工作,以小见大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而“银鱼隐喻的群体化生活与个体善意有爱的连接”,是作者对上述发展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这种个体的善意连接与群体的温情守望,在葛安荣的《换房记》(《钟山》2026年第2期)中得到具象化呈现。住在文化馆“鸽子窝”的一众同事虽因单位分房产产生罅隙,但始终没有隔绝同事之道与邻里之情。此后的“我”虽两次换房,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但疏离的人际关系、参差的住户素质令我时时怀想“鸽子窝”邻里间的亲密和睦与守望相助。

可以看到,在时代的浮躁与人情的冷漠中,总有人以赤诚之心守护职业理想,以待己之心传递温情善意。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空虚与幻灭中,人心构成了最坚硬也最为珍贵的抵抗之物。

描摹情感结构的时代流变

流动多变的现代社会重塑了人们的情感感知与思想认知,并对原有的社会情感结构产生了影响。这种经验的迭变具体体现在亲密关系中,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现。

牛健哲《可恶至今》(《湖南文学》2026年第4期)聚焦家庭破裂带给父子两代人的创伤。在母亲离去后,父亲不断尝试激怒软弱的儿子,逼迫其完成一场名为弑父的成人礼。小说借父子间跨越十几年的较量,对传统的父子关系进行思考。陈昌平《红霞》(《钟山》2026年第2期)、周芳《我长出了一对翅膀》(《江南》2026年第2期)、赵燕飞《铅笔花》(《福建文学》2026年第4期)则写出了女性在妻子、母亲与自我三种角色间的挣扎。在真实的徐茉莉、彩霞与虚构的红霞之间,陈昌平企图呈现女性在生存、情感、道德的三重压力下展现出的脆弱与坚韧、困顿与挣扎。《我长出了一对翅膀》以对照的笔法写一对姐妹迥异的人生道路:妹妹享受着作为“好妻子”“好妈妈”的幸福,姐姐却因追求自由而疯狂。通过两位女性的人生对比,作者探讨的是社会对女性主体自由的压抑。《铅笔花》将两性关系中的情感选择与利益交换推至台前。叶子的情感选择看似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实则是前夫安平与追求者李由的一场交易。结尾处被砸碎的竹椅,则是叶子对“筹码”身份的反抗。

在个体情感高度社会化的时代,上述作品直指亲密关系中隐含的情感困境,通过对不同选择下人物命运走向的书写,揭示了个体的精神/情感自由与社会性规约之间的张力,展现了不同代际间经验体系、生活感受与文化意识的差异,描摹出情感结构的时代流变。

重申数智时代的主体价值

智能科技深刻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发展,但“智能技术范式”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全面展开,引发了新的主体性危机。AI浪潮中,人的灵魂应栖居何处,我们应该如何捍卫人的主体价值,成为当下作家普遍关心的重要议题。

杨楚佳《在周一愈合》(《长江文艺》2026年第4期)写人工智能主导下人类的劳动异化:人类透支眼睛辨别筛选图像,只为给人工智能打开“视野”;作为“心灵的窗户”的眼睛,就此成为算法的燃料与工具,揭示了数智时代人类被降格为机器的极端处境。姬中亮《野中环》(《江南》2026年第2期)对后工业时代“人的异化”这一经典命题进行了逆向拆解。主人公被一辆从天而降的黄色困在中环外的野地,在车机“二吨”的指导下开始荒野求生。在近乎原始的生存境况中,作为现代工业文明集大成者的汽车,被主人公拆卸为纯粹的生存工具加以使用。在此,技术与工具不再是对人的主动性的剥夺,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算法的接入与技术的使用,而在于我们如何穿越算法与技术的迷障,确立人的主体价值。“主体性的回归与重建”是数智时代对抗“新异化”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学作为“人学”持之以恒的追求。这一命题在文学与AI的互动中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尼采曾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近期的文学新刊以丰富的题材、深广的笔触抚摸生命的纹理,探析生活的真相。在阅读中,读者得以借“文学”之眼,看见生活的万千深流,在泥沙俱下中找回逐渐失真的自我,获得拔节生长的勇气。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钟山》《江南》《福建文学》《湖南文学》《长江文艺》

看见生活的万千深流

□廖雪霞